

诗经新解

翟相君

中州古籍出版社

诗 经 新 解

翟相君

中州古籍出版社

(豫)新登字 05 号

诗 经 新 解
翟相君 著

责任编辑 贾传棠
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 (郑州市农业路 73 号)
北京新华书店发行所发行 河南郑州胜岗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7.625 印张 420 千字
1993 年 1 月第 1 版 199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2000 册

ISBN7—5348—0702—6 / 1 · 276 定价 19.50 元

《诗经》研究方法探微

(代序)

我酷爱文字改革，耗尽我十多年业余时间。我选注过秦汉散文和律诗绝句，也下过几年功夫；并不喜爱《诗经》。1978年偶然的机会使我考取研究生，1980年才开始读《诗经》。近年来发表几十篇短文，都是读《诗》时偶然所得。换句话说，我那些看法，不是经过长期地深思熟虑形成的，而是偶然产生些假设，立即查阅资料，随手作些论证，可能有不少漏洞。老实说，有些短文我就没有打稿。这些“偶得”是怎样得来的呢？

一、“集解”的启示

晚清及近代学者，对很多古籍作了“集解”或“集释”，汇集了历代各家解说。读这类书，可以很方便地了解诸家对某种古籍的解说，迫使自己从中作些选择，或另立新说。例如杜甫的《戏为六绝句》，虽然只有六首绝句，郭绍虞先生汇集了历代学者的解说，作些摘要，加上按语，就集成一本《杜甫戏为六绝句集解》。我读了郭先生的《集解》之后，写一篇《戏为六绝句的主题和结构》①，不管别人怎样评论，自认为可备一说。此文草成于学生时代，当时若无郭先生的《集解》，是不可能一览众说的，也不可能写出此文。

历代研究《诗经》者太多了，至今没有人整理出《诗经集解》或《诗经集释》。我初读《诗经》时，先从资料入手，想整理一本《国风集解》。试尝之后，感到量太大，涉及书太多，非

浅学者力所能及，于是缩小题目，对几篇诗进行集解。换言之，仿照郭先生的《集解》，选择国风中的几篇诗进行集解。虽然只选几篇小诗，要想查遍古今学者对它们的解说，也是相当困难的。有关《诗经》的书，我查阅的大约有百种，发现各家在解词、释义、分章等方面或相抵牾，或相驳难，或相因袭，犬牙交错，想分门别类作些按语，也是相当困难的。我没有整理出某篇诗的“集解”，但了解了古今学者对某篇诗的解说。分析诸说，必然会产生一些个人看法，我据此而写了《载驰试解》、《泉水新解》等文②。

不少同志问我：“你是怎样研究《诗经》的？”或说：“你把《诗经》都弄烂熟了吧！”老实说，我自认为读懂的诗约占《诗经》的三分之一。所谓读懂，就是了解了诸家解说，从中作出抉择或作出新说。这些大都写有短文，有的已公之于世了。总起来说，国风部分比较熟悉，雅颂部分还相当生疏。如果这算经验的话，读《诗经》可从单篇入手，先汇集古今诸家解说，然后从中发现问题，可能会总结出较为正确的解说。

二、敢于大胆假设

传授二千多年的《诗经》，几乎每篇诗都存在着种种分歧，例如小诗《静女》，若汇集诸家解说，则可集成厚厚一本。但大同小异者居多，敢于标新立异者属少数。有些怪说似乎很可笑，但却是正确的；有些高论，讲得头头是道，却不一定可信。当然，有些标新立异者错了，但它告诉我们：此处有问题，此说不通；或者说“此路不通”，总比那些人云亦云强。质言之，我赞成标新立异，但要尽可能多讲出几条道理。

标新立异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是相当困难的。例如《诗经》的第一篇《关雎》，如果你想标出一种新观点，立一种此为·²·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新说，首先需要了解古今各家对《关雎》的种种解说，需要查阅大量资料。如果不了解古今众说，你苦思冥想出来的新说，可能前人早就说过了。第二，当你参考了古今众说，标出了新说，还需要驳倒众说，这也是很不容易的。第三，标新立异并不是简单地提出论点，还需要有自己的论据。因为论据涉及面宽，牵连问题多，有时使你废寝忘食，日夜奋斗，终无结果；有时因找到相反的论据，使你自动地放弃了自己的新说。当然，有时因找到点滴论据而高兴，有时还会发现些新问题，使你的思路更为开阔。

标新立异需要敢于大胆假设，然后多方论证。如果能否定众说，为自己的新说找出论据，则坚持己见；若不能如此，要敢于放弃自己的假设。五十年代批判过胡适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我认为那种批判是不恰当的。胡适的研究方法是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是行之有效的方法。没有“大胆假设”，就不可能有创见；不经过“小心求证”，就树立不起新说。我认为凡是有创见的见解，必然经过假设和求证；凡是有创见的人，都会承认胡适的说法是正确的。拙文《关雎系脱简残篇》、《关雎是求贤诗》等③，都是大胆假设出来的。

当我发现《关雎》有四种分章法时，曾作过多种大胆假设，最后假设《关雎》脱简四句，按三章章八句重新分章，怀疑《关雎》的原诗应该如此：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参

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如此假设之后，我细心地多方求证，终于找出五条理由。这些理由也是先假设后求证得出的。例如，我先假设一百六十篇风诗的章句本来都是整齐的，凡章句不等者都是由脱简、传抄失误造成的。据此查得国风中章句不等者九篇，从脱简、错简、传抄失误等方面逐篇分析，都能得到比较合理的解释。《试为诗经君子偕老复原》、《诗鄘风载驰原始》、《行露脱简小考》等文④，都是为求证《关雎》脱简而获得的副产品。

我怀疑二雅中的章句有更多的脱简、错简，也作了多种大胆假设，但至今没有求证出来，有待方家研究。总之，没有大胆假设则不能立新说，没有小心求证则不能令人信服。

三、字词的通解

《诗经》每一篇的字词解释，都存在着种种分歧，而每种解释都有自己的依据。若想驳倒众说，另立新说；或者赞同某种说法，否定其他诸说，可以想象其困难程度。解决这类问题，最好的办法是从《诗经》中寻求统一的解释，即所谓通解或通释。

例如国风中有十四个“王”字，出现在《汝坟》、《何彼秾矣》、《北门》、《伯兮》、《鵲羽》、《无衣》、《下泉》七篇诗中。当代学者对这七篇诗的解说欠妥，关键是对“王”字的解释失当。我先假设这十四个“王”字皆指周王，然后逐篇考释，不仅得到比较合理的解释，而且对这些诗的时代背景提出了新解。拙文《北门臆断》、《秦风无衣管窥》等⑤，都是依据通解“王”字而写的。当然，我的论证还不完备，道理讲得简单，但我坚信，国风中的“王”字，只能一律解为周王，不可能有一个“王”字，例外地解为诸侯。通解一个“王”字，可以重新解释几篇诗。这

种方法很简便，结论也比较可信。

“君子”在《诗经》中出现一百八十二次，涉及六十一篇诗。其中国风二十篇，出现五十二次“君子”，如《关雎》、《樛木》、《草虫》、《君子偕老》、《君子于役》、《风雨》、《伐檀》等。统观当代学者对这二十篇诗的解释，“君子”的身分不可捉摸，几乎是一篇一个样。当时“君子”不可能有这么多的含意，可以肯定地说，有些解释欠妥。如果解错了诗中的人物身分，对诗意的理解必然失当。我考察了《诗经》中的“君子”，多数可以断定为周王、诸侯、大夫、贤者，凡身分不明的“君子”，都按这四种身分去验证。据此，我对一些诗提出了新解，如《周南樛木的时代和地域》、《诗经草虫新解》、《说彼君子兮》等^⑥，都是由通解“君子”提出的命题。

再如国风中的“君”字和“公”字，当代学者的解释也是因篇而异。我认为“君”和“公”单用时皆指诸侯国君，不能有例外解释，据此而写了《齐风东方未明正解》、《式微新解》、《七月新解》等文^⑦。通解一个字，可以新解几篇诗，这似乎很容易，其实也有很多甘苦。以“公”字为例，首先需要汇集有“公”字的篇章字句，这一步比较容易；然后统观古今诸家对这些篇章字句的解释，这一步涉及资料多，较难；最后以假设的通解试解各篇，这一步需要破诸说，立己说，需要作许多小心求证工作，相当困难。例如《七月》中有“献旛于公”和“跻彼公堂”，这两个“公”字解为国君，诗中的三个“公子”就应该解为公侯之子，即国君之子，这就涉及到《七月》的内容、时代、作者身分等问题，都需要作出新的解释。另外，二南中的“公侯”、“公姓”、“公族”，也需要作出合理的解释，真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若不能坚持下去，很可能半途而废，或功亏一篑。

四、比兴的探微

古今学者对《诗经》中的比兴作了不少文章，打了不少笔墨官司。我认为大都是从概念到概念，没有解决多少实际问题。朱熹说“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这是最权威的说法，但“他物”和“所咏之词”有什么内在联系呢？探讨者不多，甚至说“兴有时和正意有关，有时无关，有时有情调上的联系，有时只是从韵脚上引出下文”^⑧。若相信此说，就不能正确地理解某些诗的原意。

我认为《诗经》中的兴诗，“他物”和“所咏之词”之间存在着某种固定意义的联系，类似于现在说的“喜鹊叫，客人到”。如果说“喜鹊叫”是兴，下文说的一定是客人或吉祥之事。这种关系是固定的，人人皆知的。我分析了《诗经》中有“黄鸟”的五篇诗，证明以“黄鸟”起兴者，所咏的人则是可怜的人，或令人同情的人。我据此写了《秦风黄鸟的兴义》、《小雅黄鸟臆断》等文^⑨。要之，探讨以“黄鸟”起兴的言外之意，可以比较正确地理解有黄鸟的诗。

《诗经》中以“葛”起兴者有《葛覃》、《葛藟》、《葛生》等篇，细味这些诗可知，以葛藤无所攀附起兴者，所咏的人则是处境可怜、无可依附者；若以葛藤攀附于他物起兴，所咏的人则是有所依附者。拙文《诗经葛藟新解》、《周南葛覃的时代和地域》等^⑩，就是据此而作的新解。

我大胆地假设《诗经》中的比兴都有某种特殊含意，如同现在以狐狸比喻狡猾的人，以母老虎比喻女恶人，以乌鸦叫声象征不吉祥，等等。这些都是人人皆知的，用不着解释。我想《诗经》中的比兴，在当时也是人人皆知的，由于年代久远，言外之意大都失传，给理解原诗造成了困难。我考察了《诗经》中

的兔子和野鸡，共涉及十篇诗，通过分析，可知兔子比喻的是坏人或敌人；野鸡比喻的是好人或亲人，据此而写了《诗经周南兔置臆断》、《诗经中的兔子与野鸡》等文⑪。

怎样考知各类比兴呢？第一步，摘出比兴相同的诗，汇集历代注家对这类诗的解释，比较异同。第二步，作些大胆假设，试一试能否贯通各篇诗。第三步，小心求证，要敢于抛开传统的解说或公认的解说。若得不到证明，或者此种假设不通，可重新作假设。当然，假设也不是漫无边际的想象，尽可能以某篇为依据贯通其他各篇。我汇集了有关以采物起兴的诗，写了《诗经以采兴怀通解》⑫，证明以采物起兴的诗，都含有怀人或思家之意。我还汇集了以风雨起兴的诗，证明以风雨起兴者，都含有相会或归家之意，据此而写了《诗经终风试解》、《北风试解》等文⑬。

《诗经》中的比兴很多，它们的原始意义大都失传，因而诗意也往往被误解。要想正确地理解这些诗，除解通字句外，还需要对这类诗的比兴作些深入的探微工作。

五、试探老问题

《诗经》中有些老大难问题，争论千年，至今无定论，例如删诗问题，诗序问题，二南问题，国风非民歌问题。要想解决这类老大难问题，对初学《诗经》者来说，实在太难了。但初生之犊不怕虎，敢于怀疑古今成说，敢于标新立异，因而我初读《诗经》时就试探了这类问题。

关于删诗问题。1980年我初学《诗经》不久，两周内便草成了《孔子删诗说》⑭。当时读书很少，仅就《左传》中的《季札观乐》、《孔子世家》、《论语》等作些考辨，坚信《诗三百》是孔子编定的。老实说，这是我研读《诗经》的第一篇文章

章，当时读的书很有限，连很多应该读的常见书还没有读。后来读了些有关删诗文章，认为自己的看法还可备一说，去年公之于世了。质言之，初学者也可以碰一碰大问题。

诗序问题。这个难题我也想碰一碰，但读了张西堂先生的《关于毛诗序的一些问题》之后，感到前人已把话说尽，问题太难了，望而却步。又读了一些关于《诗序》的文章，索性作罢。换句话说，读书多了，牛犊长大了，开始怕虎了，所以至今没有敢动笔谈《诗序》。但是，在读每一篇诗时，必然要涉及诗序，必然要对诗序表示可否。我认为序的首句作于先秦，有一定的师承关系和传授依据，不可轻易否定；首句以下者为卫宏所作，有可信的，有错误的，可供参考。简言之，不可不信，不可全信。例如，我认为《旄丘》、《简兮》之序的首句本来是正确的，可惜传抄颠倒了，据此而写了《旄丘简兮试解》^⑯。至于总论《诗序》，至今感到力不从心。

二南问题。周南、召南的问题很多，聚讼不休。我认为首先需要弄懂每篇诗的诗意，诗意错了，其他争论必然错。要想确切地知道诗意，就得搞清楚二南的时代背景以及字句的注释。我对二南诗逐篇考证之后，认定二南并不是江汉流域诸小国的民歌，而应是东周王室的乐歌，于是写了《二南系东周王室诗》^⑰。我对二南的时代、性质、地域提出了不同于众的看法，所以对二十五篇诗的解说，与当今学者的解说大都不相同。我敬待方家诘难，以便深入研究二南。

国风非民歌问题。我初学国风时，认为国风大部分是民歌，想写篇驳论否认国风为民歌的文章。细读之后，我转到相反的方向，坚信国风非民歌。全面论述这个问题太难了，于是采用蚕食的办法，一篇一篇的论证。我已发表了几十篇短文，都是基于国风非民歌。有些风诗我还没有读懂，尚未成文。我想，分

别论证了各篇非民歌，国风当然不是民歌了。

总之，大而难的问题，初学者也可以碰一碰，或从某一个侧面试探，或分成小问题蚕食它，但不宜全面地系统论述。

注：

- ①拙文见1981年《河南师大学报》第5期。
- ②拙文见《文学评论丛刊》第22辑；1981年《许昌师专学报》第1期。
- ③拙文见1984年《北京师院学报》第3期；1985年《求索》第2期。
- ④拙文分别见于1984年《重庆社会科学》第2期；1985年《西北大学学报》第3期；1985年《广西大学学报》第1期。
- ⑤拙文见于1984年《山东师大学报》第1期；1985年《人文杂志》第3期。
- ⑥拙文分别见于1984年《东北师大学报》第2期；1985年《云南民族学院学报》第4期；1985年《南充师院学报》第1期。
- ⑦拙文分别见于1985年《东岳论丛》第1期；1983年《许昌师专学报》第1期；1983年《安阳师专学报》第3期。
- ⑧见科学院编的《中国文学史》。
- ⑨拙文见于1984年《西北大学学报》第4期；1984年《天津师大学报》第5期。
- ⑩拙文见于1984年《广州师院学报》第3期；1984年《贵州社会科学》第5期。
- ⑪拙文见于1984年《教学与科研》第4期；1985年《重庆社会科学》第1期。
- ⑫拙文见于1984年《温州师专学报》第2期。
- ⑬拙文见于1985年《南宁师院学报》第1期；1985年《辽宁大学学报》第6期。
- ⑭拙文见于1985年《河北学刊》第6期。
- ⑮拙文见于1985年《郑州大学学报》第4期。
- ⑯拙文见于1985年《郑州大学学报》第3期。

(原载《河北学刊》1986年第4期)

目 录

代序

—《诗经》研究方法探微 (1)

《关雎》系脱简残篇	(1)
《关雎》是求贤诗	(6)
《关雎》是求贤诗	(8)
《葛覃》的时代和地域	(24)
《樛木》的时代和地域	(32)
《桃夭》臆说	(38)
《兔罝》臆断	(41)
《汉广》的地域	(46)
《汝坟》新解	(53)
《鹊巢》新考	(61)
《采繁》《采蘋》正解	(67)
《草虫》新解	(72)
《行露》脱句小考	(79)
《羔羊》新臆	(83)
《小星》臆说	(88)
《野有死麋》有错简	(93)
二南系东周王室诗	(95)
《柏舟》试解	(106)
《燕燕》的作者	(113)

《终风》试解	(118)
《凯风》古义新释	(125)
《雄雉》新解	(131)
《匏有苦叶》臆断	(138)
《式微》新解	(145)
《旄丘》《简兮》试解	(154)
《泉水》新解	(163)
《北门》臆断	(171)
《北风》试解	(175)
《静女》小史	(182)
《柏舟》新解	(187)
《君子偕老》复原	(192)
《桑中》是讽刺诗	(201)
《鹑之奔奔》考释	(209)
《蝦蟆》新解	(217)
《载驰》试解	(228)
《载驰》原始	(240)
《考槃》臆断	(249)
《氓》诗断想	(254)
《竹竿》是许穆夫人的爱国诗	(263)
《伯兮》作于卫宣公时代	(273)
《木瓜》原始	(278)
国风非民歌说—邶、鄘、卫非民歌考论	(285)
邶、鄘、卫分编臆断	(301)
《君子于役》别解	(309)
《葛藟》新解	(314)
《风雨》正解	(318)

《野有蔓草》新解	(322)
“郑风”错简臆断	(328)
“郑声淫”辨解	(332)
《鸡鸣》是讽刺诗	(337)
《东方未明》正解	(342)
《甫田》错简臆断	(346)
《葛履》臆断	(351)
说“彼君子兮”	(356)
《蟋蟀》是爱国诗	(358)
《山有枢》辨析	(363)
《扬之水》有脱句	(370)
《鵲羽》新臆	(372)
《车邻》似残篇	(376)
《黄鸟》的兴义	(378)
《晨风》新解	(382)
《无衣》管窥	(386)
“秦风”非民歌说	(390)
“陈风”非民歌管窥	(394)
《匪风》新解	(398)
《七月》新解	(405)
《七月》历法探微	(420)
《东山》的时代及作者	(429)
国风中的怨刺诗	(435)
《鸿雁》非民歌	(447)
《黄鸟》臆断	(453)
“正月”的历法及错简	(457)
《雨无正》章句臆说	(465)

《蓼莪》新解	(470)
《北山》臆断	(476)
《隰桑》新解	(480)
《何草不黄》臆说	(486)
《诗经》风雨比兴类释	(491)
《诗经》以“采”兴“怀”通解	(501)
《诗经》中的兔子与野鸡	(507)
《诗经》里的德音	(512)
《诗经》之役车	(518)
孔子删诗说	(522)
《说文》解“隰”有误—《诗经》“隰”字考释	(536)
后记	(544)

《关雎》系脱简残篇

《关雎》是《诗经》的第一篇，古今注家对它的解说多，分歧也多。或说是言情诗，或说是贺婚诗，或说是民间情歌，或说是教育诗，等等。我们认为《关雎》是求贤诗，是东周王室的乐歌，现存的《关雎》系脱简残篇。

《关雎》共二十句，《毛传》分为三章，首章四句，后二章各八句。郑玄分为五章，每章四句。金启华先生的《国风今译》分四章，首章四句，次章八句，后二章各四句。质言之，现在并行三章、四章、五章的分法，各行其是。正确的分章只能有一种，而现行的三种分章法都不能令人满意。根据《诗经》的章法规律，各章的句数应相等，《关雎》的原诗应为三章章八句：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思服。辗转反侧。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
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也就是说，原诗应为二十四句，因脱简，第三章前四句缺。何以见得《关雎》原诗应如此？至少有五点可以佐证。

一、《关雎》有“乱”

孔子说“师挚之始，《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①。这